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
第88期（民國104年6月），223-229
©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

戴景賢，《錢賓四先生與現代中國學術》

香港：中文大學出版社，2014。507 頁。

汪榮祖*

錢穆不像現代的專家學者專治一端，是一通儒。他也應是二十世紀不可忽略的中國史學家，我曾當面問過《新史學九十年：一九○○— 》（上、下冊，香港：中文大學出版社，1986、1988）的作者許冠三，90 年間為何沒有史家錢穆？回話說：「錢穆的史學不是新史學」。這當然是許氏的偏見，當讀者看到該書終結 90 年來中國新史學集大成的所謂「史建學派」，主導者赫然是殷海光與許冠三，可見其主見與偏見之深。中國大陸自改革開放以來，文化熱、國學熱風起雲湧，錢穆也成為受人尊崇的民國國學大師之一。當今論述錢穆的中英文專書雖已為數不少，似尚有進一步公正客觀評論的餘地。

收到集刊書評編者寄來《錢賓四先生與現代中國學術》一書，欣然披覽，始知作者戴景賢乃錢穆先生及門弟子，從錢先生游長達 20 年，師生情誼之深，非同門諸君可及，且著作等身；戴子所著書，已輯為「程學閣著作集」，有 26 冊之多，名稱既古雅，涉及學術範圍亦廣，上自先秦，下及明清，有異於儕輩的專家之學，不愧為賓四門人。其著作集將由香港中文大學於 12 年內出齊，洋洋大觀可期。現已出版 4 冊，此冊即其中之一。觀乎「著作集」之緣起，得知各冊都是論文集，此冊亦不例外。當下學風如此，因學者們礙於年度考績，研究計畫多傾向較短期的論文寫作，很少人願意撰寫耗費日力的專書。論文漸

* 中央大學講座教授

多之後，結集成冊，爲了便捷，幾無打散諸文、重新寫成專書的雅興。按「專書」（monograph）有其成規，不僅首尾能呼應，而且章節之間必須環環相扣，使全書論述連貫，儼然一體，自有別於「論文集」（collected essays）之各章，可以獨立成篇。此冊論述錢穆學術思想，由於是 7 篇單獨論文的結集，以致內容時而重複，連錢穆等人的名號與生卒年也一再重複出現，相同的論點亦一再提出來說。戴書如能據其已發表之論文，另起爐灶，別撰綜合而又井然有序的論述錢學之作，則無憾矣。

錢穆生平的各類著作何止等身，戴教授特別舉出 4 本「重要」著作：《先秦諸子繫年》、《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》、《國史大綱》、《朱子新學案》，推重備至。此四書確可稱爲錢穆的代表作，《繫年》考論春秋戰國時代諸子的淵源、學派的發展與相互關係，以及年代的釐清，落筆細膩，多有建樹，早爲世人所重；固然書中也有失誤，例如考定孫武與孫臏爲一人，俟《孫臏兵法》的出土而破功；又如力言莊子在老子前，也難以令人信服，戴氏亦說「其所臆測，誠未能成立」。（頁 86）然就整體而言，《繫年》一書瑕不掩瑜，其餘三書亦非白圭無瑕。

錢穆撰《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》爲與梁啓超所撰同名書「立異」而作，戴君直言梁氏書「最大之價值，仍僅限於人物之介紹，與其學術成績之描述」（頁 16），難道錢穆亦如此認爲，故而介紹清代學者時，頗襲用梁氏原語，或轉引梁氏引文，小傳照抄梁書之處尤多，若謂船山遺書「得七十七種二百五十卷，此外未刻及已佚者猶多」（錢穆，《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》，上冊，頁 95），僅改易任公所記「佚者不少」爲「佚者猶多」而已。梁氏誤記卷數，錢穆照抄而未查書，故而沿誤。按《船山遺書》初刊於 1842 年，上海太平洋書局 1930 年重刊，正確的數字是 70 種、288 卷。平心而論，梁氏書的價值絕不限於人物介紹與學術成績之描述，錢穆論船山之觀點，實與梁啓超略同。梁推崇船山以治哲學方法治學，「比前人健實許多了」（見《梁啓超論清學史二種》，頁 182）。錢穆亦以哲學之本體論述王學之能顯眞明體，並推而演之曰：船山「理趣甚深，

持論甚卓，不徒近三百年所未有，即列之宋明諸儒，其博大閎括，幽微精警，蓋無多讓」（錢穆，《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》，上冊，頁 96）。惟錢穆嚴夷夏之辨，雖於論呂晚村一節有所發揮，卻未就船山強烈的貴華賤夷之民族本位政治與歷史觀大加論述，未免失之交臂。錢穆對於清初顧炎武、黃宗羲的評價，與梁啓超所見亦略同。所異者，梁視漢宋之爭爲實學與玄學之爭，尊漢鄙宋之意顯然，而錢絕不能容忍批宋攻朱之論，故雖認可東原考證之精卓，絕不認同其義理，力斥戴震所論爲「激越」、「深刻」、「詆毀逾分」，頗致憾焉！且不惜借重章學誠之言以批戴震，並張大實齋以抗衡東原。不僅此也，錢穆雖說方東樹攻伐漢學「肆口無忌」，仍認爲「頗足爲漢學針砭」、「並可絕其病痛者」，尤樂見其「尊護朱子」。錢穆論清學之衰，也一本其尊宋的立場。更可注意者，錢穆在《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》書中以專章述論曾國藩，將其學術地位與清代鉅子並列，贊褒逾恆，認爲其見解「有其甚卓絕者」，尤推譽國藩特重宋學，不僅知經世而且知經術，故而「滌生之歿，知經世者尚有人，知經術者則渺矣，此實同治中興所爲不可久恃一大原因也」（錢穆，《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》，下冊，頁 587、589）。錢穆及其門生皆自命無門戶偏見，戴君亦謂乃師「具體達成」破除漢宋門戶之見（頁 17），豈其然哉？錢穆撰《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》尊宋黜漢的意識型態無可掩蓋，尤重宋儒朱熹，自稱「於古今學術略有所窺，其得力最深者莫如宋明儒」（見錢穆，《宋明理學概述》序文）。其崇宋尊朱的基本心態，平生始終如一，故毋庸贅辯者也。

錢穆的《國史大綱》綱舉目張，行文簡潔可讀，成爲當年的「部定大學用書」，誰云不宜？戴書謂此書能達成「時代之需求」（頁 21），諒係指此書成於抗戰期間，意在教育國人的愛國情操，即錢穆自稱「欲其國民對國家有深厚之愛情，必先使其國民對國家已往歷史有深厚的認識」（錢穆，《國史大綱》，臺北：國立編譯館，1960，頁 3）。於此可見，錢穆也自有其「服膺之歷史觀點」，固無可疑。至於戴君說錢師此作「能超越其所處時代之限制」（頁 21），難悉何意。按錢穆撰《國史大綱》受制於時代，可以理解；若超越其時代而論此

書，如不為尊者諱，則頗有可議之處。錢穆開宗明義說：「我民族國家已往全部之活動，是為歷史」（錢穆，《國史大綱》，頁 1），乃對「歷史」此一概念作了不可能的界定，蓋「已往全部之活動」極大部份已如湖上之風，隨風而逝，留下的只是由文字記載的紀錄，包括史料與史書，而歷史知識唯有從史書中獲得。換言之，文字發明之前無歷史，史前史唯有依賴考古發掘之物證。故現代學人以有文字之殷商為中國信史的開端，不再以史前遺物與神話為上古史的開端。

最可議者，《國史大綱》的重點之一是「中國自秦漢二千年來之政治非專制」（頁 21），而戴氏不僅不以為非，而且曲為師飾，竟謂帝制尚有「制衡」（check and balance）之可言（頁 77），甚至說「『專制』（despotic dictatorship/autocracy）一詞究竟應包有多少內含？不唯學者各人之認知有差距……」（頁 76）云云。按 despotism、dictatorship、autocracy 這幾個英文字，意義明確，既然是學者，更不可能有認知上的差距。我們可以體會到當年激越之徒妄自菲薄國史之不當，國史絕非「帝王家譜」，既不「黑暗」，更無西方概念之「封建」，然若亟言二千餘年之帝制非專制，殊無必要，謂「秦始皇始一海內，而李斯、蒙恬之屬，皆以游士擅政，秦之子弟宗戚，一無預焉」，謂秦漢乃「士人政府」，謂「民權亦各自有其所以表達之方式」，謂班固之後，「中國史學已完全由皇帝宗廟下脫出，而為民間自由製作之一業焉」（錢穆，《國史大綱》，頁 12-15），既違背歷史眞實，更授人以柄，李、蒙輩之慘死，已足證專制之酷烈。錢穆自己亦不得不言明清「獨夫專制之黑暗」，然謂「其事乃起於明而完成於清」（錢穆，《國史大綱》，頁 23），豈其然哉？專制起於秦，至明清愈演愈烈耳。中華帝國的「智識階層」何來「堅實之自主性」（頁 79）？戴君說，錢穆持此說雖遭「極大之批評」，然「始終不屈」（頁 280），難道是擇善固執嗎？戴著對錢穆的史學評價甚高，認為其「觀點，必然將納入統整後之中西史學，成為其中極具特色之一支」。（頁 212）又謂「其說之於現代史學，可謂獨樹一格」。（頁 280）可惜僅見「宣示」，未見「極具特色」

以及「獨樹一格」的具體內容與令人信服之論證。

戴氏視《朱子新學案》爲重要著作，令不少讀者感到疑惑。該書雖長達百萬言，但大量抄錄朱子原作，再加以分類，僅略爲之串連；此乃剪刀與漿糊可辦之事，何勞大師出手？此種寫法依現代學術標準而言，無論是「學術史」或「思想史」，都難作示範。然而戴氏卻認爲此書極力抬高朱子，「以新的史學方法與眼光」，「爲儒學之歷史存在，所提出之新定義」。（頁 73-74）事實上，即以中國傳統學術而言，此書雖號稱「新學案」，無論才識，均難望黎洲《明儒學案》之項背，「改進後之『學案』體」（頁 87），果如是乎？

就戴君所舉錢穆代表作而言，其師之學術不出國學範疇。然而戴君亟力將錢學與西學相牽連，且喜引用西方名詞與概念來論述，殊無必要，而又因未求深解，時有誤會，若謂「因此深入討論『現代化』，必然將面對『傳統的』與『現代的』之一種思想特性上之對立」。（頁 63）按西方現代化理論未必將「傳統」與「現代」對立，日本之現代化得助於其傳統，已有定論。惟現代化必須工業化，又怎「應仍維持以『農業』爲本之立國形勢」（頁 364）？

戴氏並用「觀念史」（history of ideas）與「思想史」（intellectual history），然兩者取徑有異，不能混同。戴說錢穆「抗拒歷史定論主義（historical determinism）」，「具有不可磨滅之功勞」（頁 75），須知歷史的「決定論」（determinism）與「自由意志論」（free will）乃歷史哲學裡各領風騷的理論，尙無定論。要決定「不可磨滅之功勞」，理當要舉出錢穆在這兩種理論辯論中的具體貢獻何在，「抗拒」何用？馬克思史觀就是一種「決定論」，錢穆固然極力反對，但馬克思史學不僅僅強行於共產國家，也是西方學界一大派，英國的第一流史家如湯普森（E. P. Thompson）與霍布斯邦（Eric Hobsbawm）不僅用唯物史觀治史有成，而且還是共產黨員，豈能一筆抹殺？錢穆既不取西方「哲學系統」，戴君又何必以西方哲學名詞與概念來解釋錢學。戴說錢穆「偏近於『實在論』（realism）之主張」（頁 91），惜僅有結論而無論證，錢穆所偏近的「實在論」主張者是柏拉圖（Plato）？亞里斯多德（Aristotle）？阿奎那

（Aquinas）？皮爾士（C. S. Peirce）？摩爾（G. E. Moore）？還是懷德海（A. N. Whitehead）？戴書更無必要將錢穆與史賓格勒（Oswald Spengler）相牽扯（頁 207、209），斷言錢穆的歷史論述，近於史賓格勒。（頁 251）史氏的「文化生物學」（the morphology of culture）比較包括中國在內的八大文化，因各具特有的動能，創造出傑出的成績；然而當大文化以及次文化的創造力衰竭時，就會停滯，故此說認爲文化也是一有機體，具有興亡的生命週期。文化既然是有機體，無可避免地衰亡，一如生物之有生死。史氏之名著《西方之沒落》（*The Decline of the West*）既難讀又有爭議，錢老夫子絕無興趣閱讀。若然戴書又指出「錢先生之『文化生機論』」與史賓格勒的悲觀論不同，認爲「道德意志力量」可使文化「長久綿延」，似比史氏高明；然則如何能稱得「文化生機論」？凡生必有死也，應作「文化無機論」才對，然則若欲成此「無機說」，即使不能如史氏之長篇巨製，也不能以寥寥數語帶過。最費解者，戴氏隨後又認爲錢穆的所謂「文化形態學」「與德國哲學家史賓格勒《西方之沒落》一書之『學說性質』相近」（頁 290-291），到底「不同」呢？還是「相近」？戴著讚賞錢氏之餘，不忘批評史氏「缺乏足夠豐富之有關『義理』之人性論，故於『形態學』（morphology）之歷史論述外，並未深入於有關『普世價值』應如何建構之問題」（頁 251）；此評於史氏名著，顯然未求甚解。此外，既然「賓四師於西方近代之詮釋學，所知未多」（頁 262），又何必將錢學詮釋爲「哲學詮釋學」（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）（頁 240）？

所謂「中國現代學術」若非輸入之西學，也是借重或仿效西學，胡適與馮友蘭的《中國哲學史》，無論在體裁上或方法上，都學自西方。而錢穆之志業則在西潮衝擊下維護傳統之舊學，與胡適輩西化派兩不相容。戴君爲師門說法，卻刻意試用西學詮釋，屢提「哲學系統」、「歷史哲學」、「人類學」、「文化學」，實與賓四之學無大干係，其學之長處在國學。竊以爲戴書若能聚焦於「錢賓四先生與中國傳統學術」，或更有成效；若更能著墨於錢穆如何將國學或儒學作「創造性轉化」的業績與貢獻，則功莫大焉。

最後有些枝節問題或也有助於作者與讀者的參考。此書行文晦澀，未能尊孔聖「詞達而已」之教誨，疑難之句讀不時浮現，例不細舉，如云：「梁任公所表章〔彰〕之『學術史』觀念，並非推翻前述『學術』之定義，亦非不就導引學術發展之『概念』與『方法』之歷史演進，說明構成此一特殊之歷史面向之成分；卻是欲於學術之傳承中，尋找出『學術』與『文化體』間一種『思想關連』之詮釋」。（頁 61）又偶有驚人之語，如說「遠古時期亦可能產生偉大之思想體系與價值觀」。（頁 288）又有怪異的杜撰之詞，如「嚴格之『歷史哲學』」（頁 288）、「寬鬆定義之『文化學』」。（頁 290）又有並不恰當地將編年與紀傳視爲「動態之記史」，書與志視爲「靜態之記史」。（頁 333）至於說「錢先生之視歷史之過去非過去，歷史之未來非未來，過去、未來乃相凝合而爲一大現在」。（頁 338-339、344）然則，歷史研究的對象是「現在」而非「過去」，是無史矣！